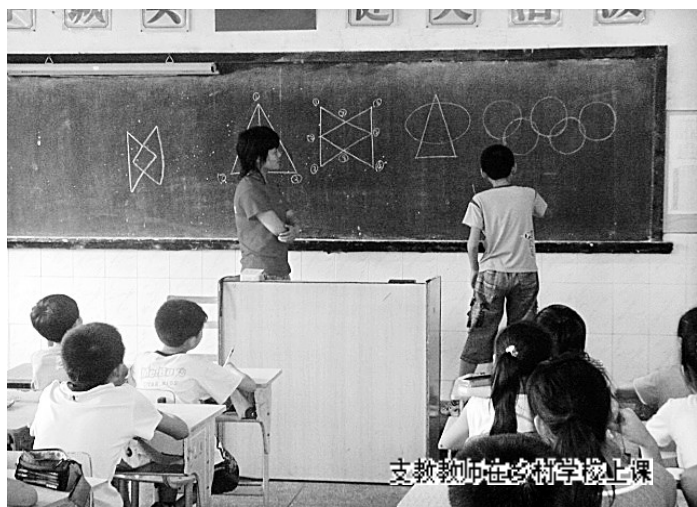


# 农村教育，有钱支教不如多搞点本土化



支教教师在乡村学校上课

中等师范教育的萎缩乃至消亡，早已成为难以扭转的趋势。国家提出三级师范向二级师范过渡，其出发点是要提升中小学师资的学历层次。这个方向无疑是对的，也符合教育发展的规律，但是，这是一个渐进的目标，还是一夜完成的目标，对于尚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中国，是需要谨慎行事的。

只有适合的教育，才是最好的教育。农村教师的培养也是如此。国情决定了农村教育有着和城市教育完全不同的特色。如果放弃了适合的中等师范教育，导致专门培养农村师资的学校急剧减少，农村教师的大批流失是必然的。而在目前条件下，让已经适应了城市生活的大学毕业生长期扎根于偏远的农村小学，还是一种奢望。

对于农村小学而言，什么样的教师才能扎下根来并实现价值？什么样的师范教育才能培养适合农村学校

实际情况的师资？这是一个值得调研的大问题。基层教育工作者提出，只有本土的、距离乡土更近的师范生才是解决农村教育师资的出路，希望教育政策的制定者能够倾听这一来自基层的建议。而中等师范教育在多年实践中形成的优良办学传统，如何在升格后的专科学校中得以继承和发扬，也值得好好思考。

编者的话

## 外地来的大学生到了农村“只要有点机会，钻也要钻走”

国家为解决农村师资问题，想了很多办法，比如鼓励城镇教师和大学毕业生赴农村支教，在6所部属师范大学实行免费师范生培养等等。但在一些基层教育工作者看来，只有本土化才是解决农村师资的最好出路，所以，他们支持定向招生培养。

九江职业大学校长卢志鹏曾担任过主管教育的副县长，对农村教育资源缺乏的状况十分了解，他认为农村的基础教育如果完全由师范大学来承担，是担不起的。“取消分配后，各县区是吃饭财政，财力有限，农村教师队伍没有及时得到更新和补充。”卢校长说，“如果师资问题不解决，农村教育将会后退10至20年。”

什么样的师资更适合农村？卢志鹏认为，是本土人才，只有他们才留得住。

星子县教育局人事股的陈股长对此深有体会。每到暑假都有老师要求调离，且大都为外地的大学毕业生，这让她觉得棘手。“只要有一点机会，钻也要钻走。”

就在几天前，县中的一位教师找到陈股长，希望回老家工作。她的家在距此几百公里的高安市，2006年，她应聘成为语文老师。“你服务还未满5年啊，那怎么办？”陈股长对她说，但女教师哭得让她很难过，“将心比心，如果是我的女儿，那怎么办？”

农村教师的艰苦已是人所共知，包括《国家教育督导报告》在内的大大小小的调查，都揭示了农村教育和农村教师不容乐观的状态。很显然，这成为许多教师离开农村学校的重要原

因。

据九江市教育局人事科副科长李青透露，许多大中专毕业生不愿到农村学校工作，永修县这几年新进的教师中，每年都有约十分之一因此选择离开。2006年，该县公开招聘92名农村小学教师，实际上只招到45名，到岗后还有不少自动离职。

尽管，教师岗位已向所有的大学毕业生敞开，报名应聘者也远高于招聘人数，但据一些教育管理者观察，很多人其实是迫于就业压力，抱着先找一个“饭碗”的心态前来应聘教师职位的。另一个问题是，在卢志鹏校长看来，那些非师范类的本专科生即使拿到了教师资格证，“能否适应中小学教学，还要打个大问号”。九江职业大学的潘留芳教授曾多次担任过教师资格证考核的评委，他感叹说：“在农村要取得教师资格证，太容易了，一些学校的职工也摇身一变具备了教师从业资格。”

## 有钱支教不如多搞本土化

陈股长认为，既然国家有钱推行支教计划，何不把这些钱转移到解决本土化师资上来？她说：“我们更希望招收师范类的毕业生，而且只有家在本地的大专毕业生才会安心。”



九江职业大学一景 (均为资料图片)

这在华林中心小学得到了印证。它距离星子县城大约20多公里，学校的28名教师中，只有一家在外地。汪桂梅老师从小在县城长大，2002年她从九江师范学校毕业来到这里，看到“地面不平，窗户上贴的都是油布”。她坦言初来乍到“有一种失落感”，好在她每天放学后都可以回到县城的家中，也渐渐习惯了这种生活。

她的同事欧阳文平作为土生土长的农村人，“老家离学校只有四五公里”，来到这里就没有感觉到什么落差。他最初在条件更差的村小工作了三年，2006年来到中心小学担任教导处副主任，并很快转岗为主任。

和九江市的许多农村学校一样，支撑起华林中心小学的主要力量，还是来自九江师范学校的毕业生。他们除了带一门主课之外，大都还要兼上体育、科学、音乐、美术等几门副课。

限于学校的条件，“连基本的教具都没地方买”，向玲老师无力把在师范学校掌握的一些手工活和小制作“教给孩子们”。她带着学生一起画画，没有画笔，只有铅笔和普通的作业本，即便如此，她还是惊喜地发现班里有不少孩子“很有天赋，很有创意”。

而据九江市教育局了解，该市农村学校的英语、计算机和音乐美术老师奇缺，全市98%的村小没有上述学科教师，即便有相应设备，这些课也不能正常开设，急需师范学校提供资源。

## 吃饭财政让“三定方案”跟进实施有难度

合并后的九江职业大学仍将坚定不移地致力于打造

小学师资的培养基地，那如何为农村输送“进得去、留得住、教得好”的高素质师资，就是卢志鹏要着力考虑的重大问题。他向市政府汇报了学校的想法：希望实行“三定向”的培养模式。

市政府为此召开专题会议，确立了面向农村小学培养大专层次小学教师的“三定”方案。九江市教育局的一份材料认为：自2001年师范生取消包分配后，有的县级政府为减轻财政压力，采取“有编不补”或“多退少补”的方式补充教师，每年引进教师数量还达不到退休、调离等自然减员数，甚至更少。

在九江市实行“三定向”的第二年，江西省将这一做法推广到了全省。

据九江市教育局的材料，该市农村共有公办中小学校1610所(其中中小学1348所)。根据农村学校配备教师的实际需要，缺口教师约2600人。有的县一位农村小学教师包教1-2个班的现象很普遍。

星子县在过去三年一共完成了101个定向指标，他们根据边远农村小学教师的缺额情况，把这些名额分解到了各个乡镇，2008年的40个指标，吸引了500多人报考，其中不乏成绩优秀者。2009年，该县教育局又准备向县政府写报告，申请定向指标，但这需要和人事、财政、编办等多个部门协调，“要花很多精力”。县教育局人事股的一位副股长希望能有政策“硬性规定每年50个指标”，这样就基本能够补充该县每年自然减员的教师数。

据《中国青年报》

## 核心提示

中考填报志愿时，梅钰毫不犹豫地选择了九江职业大学的五年制师范教育定向班。一些同学觉得这“尖子生”读师范“太浪费”，多次劝说她改读德安一中。梅钰在同学录里回应说：“我长大后就是想做个老师，正好可以让你知道，有这样一个机会可以成就我的梦想。”

根据江西省九江市政府决定，九江职业大学从2006年开始实行“定向招生、定向培养、定向就业”的师范生政策，这让梅钰觉得自己与培养优秀师资的老师感到很失落——好在“定向”的生源多少扫去了一点师范招生的低迷之气。

2008年，德安县只安排了20个五年制师范的定向指标，但报考者却超过了500人。一名高考分数超过二本线10分的学生，最终放弃读本科的机会，进入九江职大的三年制师范教育定向班。该校师范学院院长胡玉东用“火爆”二字形容这项政策的吸引力。

据了解，确保毕业后有一个稳定的工作，是这些农村孩子自愿选择“定向”师范的主要原因。刚刚过去的春节里，王威的妈妈参加了县里的一场招聘会，发现很多大学生应聘的工作“虽然比农民工舒服点，但工资比农民工还要低”。

在农村，中师生曾经是一个颇为走俏的身份，但自从毕业不包分配以后，其地位一落千丈，进而导致师范学校的生源质量急剧下滑。过去几年，一批中考分数在两三百左右的学生涌入了九江师范学校和新的九江职业大学，有的家长让孩子填报这类专业只是“不想让他过早进入社会，以免变坏”。这让那些致力于培养优秀师资的老师感到很失落——好在“定向”的生源多少扫去了一点师范招生的低迷之气。

# 新闻时评

## 网友公布财产 无法倒逼官员公开

两会期间，某官员政协委员针对记者“官员何时公开财产”的提问，雷人地反问“为什么老百姓不公开财产”，激起了舆论的热议。原以为这种带着挑衅意味的反问会激怒网民，没想到网民们坦荡地响应起官员的提议，纷纷在各大论坛晒出自己的财产明细，在欢迎监督的同时，热切期盼官员们能后来跟上。(3月16日《华商报》)

我们公布了，就等你们了——这个反挑衅的宣言更有挑衅意味。睿智的倒逼，把官员逼到悬崖边无处可退。按理说老百姓根本无需公布财产，官员“为什么老百姓不公布财产”的反问纯属刁钻狡辩、无理取闹。要让老百姓公布财产，首先得问一下为什么不用公款给老百姓发工资？为什么不给老百姓配备公车？多在公务福利上反问几个为什么，就会想通这个问题。另一方面，如果实在羡慕老百姓有这样的隐私权，索性放弃官职当平民百姓。老百姓肯定很愿意让渡这种隐私权而当官，可你愿意吗？官员有可能利用公权牟取不正当利益，官员受纳税人之雇为公共服务，所以得公开财产自证清白，接受主人监督。这是一个不证自明的现代政治常识。

然而，老百姓没有愤怒地取斥官员，而是接受挑衅公开收入，这一方面是借此表达一种对自身阳光财产的自信；靠辛勤劳动挣来的阳光财富经不起任何苛刻的审视，没有灰色收入绝不弹于公开，只有不干净的财产才经不起阳光照射。另一方面是借此倒逼官员：不是在“为什么老百姓不公布财产”上想不通吗，如今我们公开了，就等你们了。

我相信，网民绝不是指望这种反问真能够倒逼官员公布财产，只是以这种方式对“为什么老百姓不公布财产”的荒唐反问表达抗议，以这种方式恶搞、反讽、嘲弄官员在财产公开问题上一再的推诿、拖延甚至拒绝，以这种方式羞辱许多官员“惧怕财产见阳光”的畏惧心理和发泄对官员的不满：纯净者无畏，不干净才会害怕。

不过，网民的这种倒逼是触动不了某些官员在“始终不公开”问题上之坚定的。如果他们能受到触动，能对“倒逼”产生感觉，早就有过无数次倒逼他们公开财产的机会。官员财产申报早已成为一种反腐利器，从欧美到日韩，从越南到俄罗斯，世界上多数国家都采用这种阳光制度进行反腐，“国际反腐惯例和常识”对中国不是一种有力的倒逼吗？可我们许多官员根本无视这种惯例的倒逼，而是不以耻地以“特殊的国情”为挡箭牌。

那位官员嚣张地反问“为什么老百姓不公开财产”，这是一种骨子里根深蒂固的权力傲慢，借机宣示自己不容置疑、不容侵犯的官威：我就不公开，你能拿我怎么样？

我们公开了，就等你们了——这只是网民一厢情愿的想法，官员根本不会傻到跟进这种公开。某些官员一定会鄙视地想：你公开你的，我自岿然不动，你能拿我怎么办？确实，官员财产公开，逼是逼不出来的，靠道德自觉也根本靠不住。只有某一天纳税人能在制度上给官员颜色看时，不得扬鞭自奋蹄，那时候他们就自然会迫不及待地要求公开财产了。

曹林

## 滥用权力的一个标本

公权力的滥用，公权力的异化，在当下可以达到无比雷人的程度。看看湖北大冶官员的做法：谁能邀请世界500强企业董事长、总裁或总经理到大冶市考察，每人每次由当地财政奖励1.2万元。成功引进项目，最高可以奖励50万元。大冶市近日公布的一项招商引资规定，引来各方热议。目前，这项规定仍然挂在大冶市政府网站信息公开栏目里。(3月16日《人民日报》)

大冶市有关部门负责人称，出台这样的办法，不求企业老总来了就投资，意在提高大冶的知名度和影响力，使企业将来投资时能想到大冶。官员主导的招商模式，本身就是个问题。一

些地方轰轰烈烈地招商，引来的资金，还没有招商官员花费的多。如此招商，让人说来，像是个笑柄。而大冶的惊人做法，就更离谱了。且不说招商官员的一厢情愿，也不说招商行为所伴随的权力运用方式的扭曲，招商竟是为了形象，而且还是虚拟的形象，不求世界500强企业董事长、总裁或总经理的投资，他们来了看看也行，甚至于他们能想到大冶就行。这是一种什么思维？那些日夜为自己的利润而奔波的企业家会关心大冶制定什么奖励政策吗？他们是来大冶的官员所想象的游山玩水的主儿吗？500强企业董事长、总裁或总经理会被某种忽悠所吸引，不

自己的产业布局，进行毫无目的地考察吗？他们都是聪明又精明的商人，没有强烈的投资意愿，不会主动去会见大冶招商的官员或被大冶招商官员会见。世界500强、某日资企业(中国)公司公关部女士，对这种游戏的基本规则一语道明：企业着眼于全球的布局，看重的是投资环境和市场前景。

官员所主导的招商，参与招商的都是些官员，它原本就是某些政府部门的工作职责，大冶的这种说法，说穿了，不就是拿着纳税人的钱，官员奖官员吗？无论怎么讲，它都无现实的法律法规依据。就是官府不差钱，也不能这样做。

今语



漫画：西安一家幼儿园竟收“识字费” 丁丁画



漫画：甜蜜的记忆 友华作

## 铁路票价市场化 还只是幻觉

火车票可以打折了，这样的消息无疑是足够醒目的。据《京华时报》3月16日报道，根据铁道部最新规定，从3月15日开始至6月30日，铁路部门将对列车运行中的短途空闲卧铺进行打折，优惠幅度在20%~50%之间。

在客运的淡季懂得打折促销，当然是一种市场化的思维，是垄断企业脑筋开窍的表现。其实，铁老大保持这种思维已经好多年了——空闲列车卧铺实行打折政策，铁道部已经实行过三次，分别是1984年、1998年、2002年。之所以没几个人记得这三次打折，是因为这样的政策徒具观赏性，不具备多少可操作性。仔细解读一下本次打折政策内容，就明白了。

根据新出台的《关于短途卧铺票价优惠办法的通知》，列车运行最后一日(含当日运行)6点以后的空闲卧铺可以执行卧铺优惠票价。符合这一优惠条件的列车，将分200公里以内和200公里至400公里运行区段计算卧铺优惠票价——看出来没有，可以打折的卧铺是列车即将结束旅程的最后一日，而且是白天，能享受折扣的旅程也只有区区200公里至400公里。想想看，这么短的路程在原位上再坐一两个小时就结束，相信没几个人熬过一晚后还有兴趣再贵事去换一个卧铺。何况在客运的淡季，一个客位可以占几个硬座，跟睡卧铺相差无几。

如此这般的票价改革措施，对铁老大来说可能算是一件大事了，他们没准儿认为此举已经很慷慨了呢！然对于旅客们来说，所谓的降价，所谓的市场化，不过是一种幻觉罢了——火车票的降价，的确很强大，但你就是无法真正从中获得实惠。所以我说，铁老大的营销措施几乎发挥不了作用，不但达不到营利的目的，而且还浪费了政策制定所生产的行政成本。

其实，铁路部门早就该向民航学习，将淡季打折常态化、普遍化。铁老大不要总是觉得自己是垄断者，而高枕无忧，从而弱化了改革的动力。当下的形势已大不如前了，民航票价在淡季时一降再降，甚至还出现了若干“一元”机票的民营航空公司；燃油税推出后，公路运输成本也在逐步降低。可以说，铁路的竞争对手，尤其是淡季期间的竞争对手，是很强大的。所以，先有市场化的思维还不行，关键还得有舍得让利于民的魄力与胆识。

我建议铁老大不妨以客票打折为契机，推进市场化改革。铁老大不要担心便宜了乘客，而不愿意放开价格。要知道乘客们不仅仅是市场上的衣食父母，更是拿财政供养自己的“直系”父母。当然，更为关键的是，在营销战场上，只有舍得让利才能获利。所以在淡季，所有的卧铺与硬座都打折才能提高上座率，才能实现运方与乘方的双赢。有了这样开阔的胸襟，铁老大的市场化改革也就不至于裹足不前了。

楷桦

## 谁是花瓶院士的栽培者

浙江大学药学院论文剽窃事件发生后，处于风口浪尖的李连达院士抛出一个理由：自己在不同兼职机构中带有50多名博士和博士后，时间不够、精力不够。院士兼职过多，成为人们热议的焦点。(3月16日《人民日报》)

“花瓶院士”当然应该受到严厉批评。可批评之余，我们更要深思和追问“花瓶院士”走俏背后的诸多问题。院士学术道德考核机制过于软化。道德考核制度成为摆设，是不带电的高压线。一方面是雷声大雨点小

的考核制度，一方面是财源滚滚的金色诱惑，院士们就会放大物欲，而扔掉道德信仰。院士走穴现象有增无减，院士道德滑坡、诚信流失继续加剧，学术空气日益变得浮躁而急功近利，与这种过于软化的考评制度关系密切。

为了“引进”、好看、谋求项目资金，而不是为了推动学术发展，“院士”被炒作为为花瓶院士，成为学术空手套白狼。有关部门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对“花瓶制度”执迷不悟，才造成更多院士能得到更多兼职机会。

纠缠学术道德不妨建立院士退出机制，院士荣誉不能实行终身制，终身制会抑制院士学术创造的积极性和道德自律的精神慎独，而应建立流动机制和退出机制，对那些已经当选的院士，要建立阶段性考核机制，合格了可以继续当选院士，如果不合格，出现了道德滑坡，或者是学术能力停滞不前，就应该剥夺其院士称号。用竞争机制激活院士的学术创造力和道德自重，“花瓶院士”现象就能大大避免。

刘克梅